



敦煌文献·考古·艺术综合研究

纪念向达先生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樊锦诗 荣新江 林世田 主编

中華書局



敦煌文献·考古·艺术综合研究

纪念向达先生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樊锦诗 荣新江 林世田 主编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敦煌文献·考古·艺术综合研究:纪念向达先生诞辰 11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 樊锦诗, 荣新江, 林世田主编. —北京: 中华书局, 2011.12

ISBN 978 - 7 - 101- 08337 - 8

I. 敦… II. ①樊…②荣…③林… III. 向达(1900 ~ 1966)—纪念文集 IV. K825.8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33491 号

书 名 敦煌文献·考古·艺术综合研究
——纪念向达先生诞辰 110 周年国际学术
研讨会论文集

主 编 樊锦诗 荣新江 林世田

责任编辑 李 静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天来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1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11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38½ 插页 2 字数 800 千字

印 数 1-1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978 - 7 - 101- 08337 - 8

定 价 128.00 元

感 谢

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

大力资助

编委会

主编：樊锦诗 荣新江 林世田

编委：樊锦诗 林世田 刘 波 孟彦弘

荣新江 史 睿 张先堂 朱丽双

会议主办单位：中国国家图书馆古籍馆

北京大学历史系暨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敦煌研究院

目 录

前 言

缅怀前贤，激励来者

——向达先生对敦煌学研究的贡献 樊锦诗 (1)

向达研究

书札中的雪泥鸿迹

——中华书局所藏向达致舒新城书札释读 徐 俊 (6)

向达在英国 吴芳思 (Frances Wood) (18)

西出阳关

——向达与西北史地考察团 罗 丰 (21)

从历史语言研究所藏向达手稿论其对敦煌学的影响 胡素馨 (43)

从向达致方豪的一封信谈起

——兼论向达对明末清初西学之研究 冯锦荣 (60)

向达先生手批本《佛国记》跋 黄 征 (98)

关于《向达文集》的编辑与出版

——纪念向达先生诞辰 110 周年 徐文堪 (104)

一位倔犟的历史学家

——向达别传 孟彦弘 (110)

考古与艺术

从政治和文化的角度看敦煌学视野下的汉简研究 张德芳 (146)

西北科学考察团发掘敦煌翟宗盈画像砖墓述论 殷光明 (157)

从《药师佛净土图》到《药师佛佛会图》

——药师经变的不同解析 孟嗣徽 (169)

图文互证

- 于阗八大守护神新探 荣新江 朱丽双 (190)
- 瓜州东千佛洞第2窟观音菩萨、多罗菩萨救济八难曼荼罗解说 刘永增 (219)

中外关系

- 敦煌乘马“日天”和乘鹅“月天”图像研究 张元林 (233)
- 西藏西部新出土古代丝织物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
- 附论唐初经吐蕃通印度之西北道 霍 巍 (247)
- 敦煌的粟特胡人画像
- 莫高窟第359窟东壁门上新释读石姓男供养像札记 沙武田 (262)
- 敦煌佛寺所藏宝物的性质与功用蠡测 余 欣 (277)
- 慧立卒年推测 赵和平 (288)

西域文史

宝藏遗踪

- 近年来和田地区新出非汉语类文书综述 段 晴 (293)
- 国图藏西域出土《观世音菩萨劝攘灾经》研究 林世田 刘 波 (306)
- 于阗文占卜文书 刘文锁 (319)
- 英国图书馆藏三件于阗文文书的比定 陈怀宇 (330)
- 敦煌古藏文佛教文献、塔波寺文书和《禅定目炬》研究：
- 对新近研究成果的评述 沈卫荣 (339)
- 身份认同
- 敦煌吐蕃装人物进入洞窟的条件、策略与时间 罗世平 (354)
- 再论沙州回鹘国的成立 杨富学 (365)

唐代社会与文化

- 唐五代俗讲中之高座考论 郑阿财 (386)
- 唐代僧尼授田问题新探
- 以新获吐鲁番文书为中心 姚崇新 (404)
- 吐鲁番出土《唐开元十六年西州都督府请纸案卷》与唐代的公文用纸 雷 闻 (423)
- 论社司转帖的书写 孟宪实 (445)
- 晚唐至宋初敦煌地方长官在石窟供养人画像中的地位 张先堂 (455)

关于“敛发”与“散发”

- 论少数民族风俗对丧礼影响之一例 吴丽娱 (467)

文献学与书籍史

敦煌土地庙发现的《诗经注》残卷

- 读《王重民向达所摄敦煌西域文献照片合集》札记之一 王 素 (476)
- 《天地开辟已来帝王纪》校议 许建平 (485)
- 敦煌写本 P. 2683《瑞应图》研究 郑炳林 郑怡楠 (493)
- 国家图书馆藏敦煌写本《逆刺占》札记（附《逆刺占一卷》录文） 黄正建 (514)
- 向达先生摹抄本《上元金篆简文》残卷重识 刘 屹 (535)
- 中村不折藏传吐鲁番出小字本《妙法莲华经》雕版年代补证 李际宁 (549)
- 论敦煌文献叙事图文结合之形式与功能 朱凤玉 (557)
- 王树楠与敦煌文献的收藏和研究 朱玉麒 (574)
- 董康《敦煌书录》的初步研究 史 睿 王 楠 (591)

后记

“敦煌文献·考古·艺术综合研究

- 纪念向达先生诞辰 11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小结 荣新江 (605)

缅怀前贤，激励来者

——向达先生对敦煌学研究的贡献

樊锦诗

(敦煌研究院)

向达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中西交通史和敦煌学专家。他治学严谨，成就卓著，堪称一代宗师。“高山仰之，景行行之。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在纪念先生诞辰 110 周年之际，我们缅怀先生崇高的学者风范和卓越的学术成就，追忆他对祖国优秀文化遗产——敦煌石窟保护和研究所做出的杰出贡献，深切地感受到了他对敦煌文物所抱有的挚爱之情，认识到了他为我们留下的高贵品格和学术遗产之宝贵价值，更增添了我们这位我国敦煌学先驱者无比的景仰之情。

向达先生曾于 20 世纪 40 年代初两次赴西北、敦煌考察。这两次实地考察以及此前的赴欧考察敦煌文献，使得向达先生与敦煌、敦煌学结下了终其一生的不解缘分。向达先生在其 1957 年版《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的“作者致辞”中，曾深情回忆起他与敦煌和敦煌学的缘分，他说：“回想以前埋首伏案于伦敦、巴黎的图书馆中摸索敦煌残卷，以及匹马孤征，仆仆于惊沙大漠之间，深夜秉烛，独自欣赏六朝以及唐人的壁画，那种‘搥埴索涂’、‘空山寂历’的情形，真是如同隔世！但是今天我们的心情不是过去的所谓‘感慨系之’，而是‘凡在见闻，莫不欣跃！’”^①先生对敦煌和敦煌学感情之深，跃然纸上。我想，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这里深切缅怀这位敦煌学的一代宗师时的共同感受。

向达先生对敦煌石窟保护和研究所做的贡献，多位学者在各种怀念文章和回顾中都有不同程度的提及。特别是荣新江先生的专文所言备详^②。尽管如此，今天我还是要再一次回忆向达先生与敦煌结下的不解缘分和他的杰出贡献。我以为，先生对敦煌石窟的保护和研究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远赴欧洲，调查敦煌文书

向达先生与敦煌学的缘分，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纪 30 年代。藏经洞文物自 1900 年被发现后，受外国探险家劫掠，流散于世界各国，其中大部分分藏于英国和法国等欧洲国家。向达先

①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87 年，第 2—3 页。

② 荣新江《惊沙撼大漠——向达的敦煌考察及其学术意义》，同氏著《辩伪与存真——敦煌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 199—235 页。

生在国立北平图书馆工作出色,1935年,他被派往欧洲调查和研究流散的敦煌文书。向达先生先赴英伦,克服种种困难和刁难,调查了五百多卷敦煌文书,并作了大量的摘抄。后又转赴巴黎及柏林的博物馆抄写法藏和德藏敦煌吐鲁番文书。1935—1938年,他把所能看到的敦煌文书都用工整秀丽的唐人小楷作了详细的抄录、写成目录提要,累计抄写了数百万字的摘抄。他先后撰写了《伦敦的敦煌俗文学》(1937年)和《伦敦所藏敦煌卷子经眼目录》(1939年)等文。特别是前文,共收录了40余篇敦煌俗文学作品,可以说是利用敦煌文书研究俗文学的“拓荒之作”,为敦煌俗文学史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沈从文先生在1945年所作的《湘人对于新文学运动的贡献》一文中,特别提到了向达先生对俗文学研究的贡献:“新文学运动工作之一种,即用新的方法认识遗产。从这个观点出发,对白话小说的前期唐代白话小说的发源于讲经中‘俗讲’研究,做出极大努力、为学人称道,认为有特殊成就的,当为向达先生的工作。向先生在这方面努力治学,生活素朴,为人诚恳,尤足为吾湘年青朋友师法。”^①

二、呼吁加强敦煌石窟的保护

1941年,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西北史地考察团,其中的历史考古组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院与国立北京大学联合组成,向达代表北京大学参加,并任历史考古组主任。他于1942年10月9日到达敦煌,10日考察了千佛洞(莫高窟),11日即在给友人曾昭燏的信中描述了他第一次见到敦煌石窟艺术时的激动和因石窟遭受自然破坏时的忧心,及萌生的保护念头——“六朝诸窟,素朴庄严,李唐诸窟,雍容华贵。唐窟诸供养女像最佳,面容丰满,仪态万方,几欲拜倒,真可称为国宝!唯风水剥蚀,流沙壅塞,洞窟淹没者,与年俱增,保护之举,正不宜缓耳。”此后,他又先后在致李济、傅斯年和曾昭燏的信中多次呼吁加强敦煌石窟的保护。不仅如此,出于一个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对祖国优秀传统文化遗产的拳拳之心,他还撰文呼吁将敦煌石窟的保护和管理收归国有,由学术机关进行管理和开展研究工作。在文中,他对当时个别文化名流在莫高窟原壁上描画、题写和随意剥离壁画的行为表达了强烈的愤慨和担忧,说“……我们自己却把中国艺术上独一无二的一个例子,千百年来先民精神心血所寄托所创造的一件极其精美的作品,任其自毁,士大夫不知爱护,国家不去管理,这是令人看来最难过的一件事!”^②还提出加强敦煌石窟保护与管理的具体建议:一、敦煌千佛洞亟应收归国有;二、千佛洞收归国有之后,应交由纯粹学术机关管理,设立一千佛洞管理所;三、在技术问题没有得到圆满解决之前,在千佛洞研究或临摹工作的人,不可轻易动手剥离画面。他甚至提出了一些非常细致的日常管理措施,如雇人每天清扫洞窟流沙,安排常

^① 《沈从文文集》第12卷(文论),花城出版社,1984年,第202页。

^② 方回(向达)《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原载重庆《大公报》1942年12月27、28、30日;转载《新西北月刊》第7卷第2、3期合刊,1944年;收录于《中国敦煌学百年文库》(综述卷),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年,第191—202页。

驻警卫人员,不准在窟内焚烧香火,对一些最宝贵洞窟采取特别的管理措施等等。此文经傅斯年先生推荐,以“方回”的笔名,首先在重庆《大公报》上连载发表,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关注。现在谈到敦煌研究院的前身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成立,都知道国民政府监察院长于右任先生的建议之功,而实际上,向达先生对社会的呼吁,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要的促成作用。他提出的这些保护和管理建议,被不久后成立的敦煌艺术研究所采纳,成为敦煌石窟保护和管理的日常措施;而他关于不可轻易剥离壁画的主张,也是敦煌研究院几十年来在壁画保护和管理工作中一直遵循的重要原则。

三、开拓了将文献研究与石窟调查、考古调查相结合的研究道路

向达先生在敦煌学研究方面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遗产,除了他远赴欧洲调查研究的敦煌文书外,更重要的是,他两次远披流沙、赴西北考察所取得的敦煌学研究成果及所创立的将文献研究与实地调查、考古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我国敦煌学自20世纪初发轫至40年代初,已成为当时学术界的新潮流,研究人才辈出,研究领域扩展。但敦煌学研究多为敦煌文献的研究,而且各个领域的研究往往是各自独立进行。能亲至西北、敦煌实地考察石窟者寥寥无几。向达先生40年代初的两次西北考察,创造了将文献研究与实地考古调查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不只使他的敦煌学研究建立在更为坚实的实物资料的基础之上,从而能够正前人所谬,发前人所未发,而且也推动敦煌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科学方法。

他第一次的西北考察,一路上先后考察了武威、张掖、酒泉等地的古迹。到达敦煌后,他调查了莫高窟、西千佛洞、榆林窟,还考察了敦煌寿昌城城址、南湖古董滩、汉长城沿线的大、小方盘城遗址,敦煌城西南五里的岷州庙,并在岷州庙发现了六朝经幢,以及安西破城子遗址。第二次考察中,先后考察了酒泉文殊山石窟、酒泉金塔县汉代烽燧遗址,挖掘了敦煌佛爷庙古墓群,并再次详细考察了敦煌莫高窟。在此期间,还亲历了敦煌艺术研究所在莫高窟发现土地庙残经的过程^①。据荣新江先生分析,向达先生第二次的敦煌考察,主要想发掘他第一次考察期间所勘查过的古墓群,希望在敦煌文书、石窟之外,开辟敦煌学的新领域,但由于这些古墓多数被盗掘,结果并不如希望的那样大,最大的收获仍在于石窟考察。

向达先生以《瓜沙谈往》为题发表的《西征小记》、《两关杂考》、《莫高、榆林两窟杂考》、《罗叔言〈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等四篇文章,是他两次考察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的集中体现。这些文章后来收录于《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一书中。如在对敦煌、河西地区古迹调查简记和敦煌地区散见敦煌文献调查记录的《西征小记》中讲,他在武威文庙见到木塔,得知木塔中原有小银塔,塔上镌“于阗国王大师从德”的铭文时,虽未见到银塔实物,但他根据掌握的史料,敏锐地推断道:“五代时于阗与瓜沙曹氏互为婚姻,则此当是于阗国供养千佛洞(此

^① 荣新江先生上引文对向达两次西北考察过程所述甚详,请参看。

指敦煌莫高窟——引者)之物。银塔所镌铭文虽未窥其全,然其有裨于瓜沙曹氏与于阗关系之研究则无疑也。”^①又如他在《两关杂考》一文中,通过实地考察,结合汉简、敦煌文书以及史籍的记载,肯定了沙畹、王国维汉代玉门关在小方盘城的结论,同时又反驳二位关于太初二年之前玉门关在敦煌东面的看法,并进而研究了玉门关在汉唐之间迁徙时间和位置。关于汉代阳关遗址,向达先生在充分比证历史文献的基础上,认为是今名古董滩的地方,又以实地考察所见予以佐证云:“〔红山〕口西山峰上一汉墩翼然高耸,自敦煌赴南湖未至四十里,即见此墩。阳关设于口内,而以此墩为其眼目,盖可想而知已也。”^②向达先生的汉代敦煌“两关”考证,是出自他亲自实地踏勘与文献记载相结合的成果。在《罗叔言〈补唐书张议潮传〉补正》一文中,他根据考察所校录的敦煌石窟供养人题记和新发现的敦煌文书材料,对罗振玉的原文作了极其重要的补充和修正,这是研究方法上的创新,被认为是敦煌归义军史研究的重要阶段成果。特别是《莫高、榆林两窟杂考》一文,可以说是用考古与文献结合的方法研究敦煌石窟艺术的开拓文章。此文由《武周李君修佛龕记中之东阳王事迹考》、《榆林窟小记》、《敦煌佛教艺术与西域之关系》三节组成。第一节,向达先生充分利用正史和敦煌写经题记,在赞同贺昌群先生关于元荣即东阳王的观点的同时,也指出“元太荣亦写作元荣,并非有脱文也”。^③第二节,他通过洞窟形制和壁画风格对比,推翻了斯坦因早前认为的榆林窟创于9至10世纪、题名皆为元代之说的观点,认为:“疑亦始创于六朝,唯以迭经后人重修,遂致魏隋画迹悉归泯没耳。”^④特别是最后一节,向达先生从壁画制度、粉本比例及其他,天竺传来凹凸画法、绘画中之空间观念等讨论出发,进而引申出敦煌艺术与印度、西域艺术的关系、瓜沙曹氏画院的设立、西域明暗技法在敦煌壁画中的应用等诸多重要问题的研究。如在详细引用宋《营造法式》关于壁画的制作工序的记载,分析莫高、榆林二窟壁画制作工艺后,又与印度阿旃陀壁画进行了比较,认为“印度画壁制度与新疆库车、吐鲁番以及敦煌所见者相同,惟所用材料因地域出产不同而略有出入,大体固不殊也”^⑤。又如在详细分析、比较中印绘画文献中关于粉本和比例的论述后,又证之以莫高窟第130窟太原王氏出行图及第156窟张议潮和宋氏出行图人物形象比例,认为“敦煌当日画家接受印度绘画之技术及理论,即此所举可见一斑也”^⑥。而对于印度经西域传入敦煌的凹凸画法的影响,尤证之甚详,指出:“敦煌魏、隋、唐、宋诸窟壁画人物大都用铁线描,纤细之朱墨线条描绘轮廓,然后以浓朱沿轮廓线条内部晕染一遍,如手臂之类,至中渐淡渐浅;远视中间突起,即之俨然如真。”且以此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突出实例:“凹凸法技术自印度传至新疆,由新疆以至于敦煌,东西文化之

①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第340页。

② 同上,第375页。

③ 同上,第397页。

④ 同上,第402页。

⑤ 同上,第405页。

⑥ 同上,第409页。

交流,此其一端也。”^①向达先生经过分析中国传统画论,特别是宋元以来中国传统绘画空间布局,与敦煌佛教壁画比较后,认为敦煌经变画布局之所以稠密,是受印度佛教壁画影响所致:“其绘经变,佛坐中央,绕以菩萨罗汉天龙八部,上下左右隙地别绘与经变有关故事。如弥勒下生变,宝池下于七宝供养外,附以穰佉王子及王妃剃度之像,上方左右则为宝城及一种七收等故事。必使画面所有隙地几于全部填塞充满而后已。此在宋以后以山水画为正宗之中国画中便甚罕见。然而印度阿旃陀诸石窟壁画则与我国六朝、隋、唐之作,若合符契。此种作风自印度传于西域,如高昌、龟兹诸国,复由西域东被以至敦煌,其间传布途径斑斑可考。则敦煌佛教艺术之导源西域,固可深思也。”^②他还对石窟和敦煌文献中的各种画史史料予以特别关注,并推断瓜沙曹氏归义军设有专门的画院,其中还有来自印度、西域的画工。“由以上诸题名结衔推测,疑瓜、沙曹氏之世盖设有画院,掌院事者曰都勾当画院使。……敦煌诸窟壁画中虽至今尚未发见西域画家题名,然而勾当画院者为印度人,都画匠作为龟兹人,而知金银行都料亦籍隶于阗。”他并由此兴奋而大胆地预测,未来的研究将进一步证明,敦煌艺术实是一个融汇中西艺术的不朽范例:“有此种种旁证,则假设以为制作莫高、榆林诸窟壁画之艺人中亦有西域画家从事其间,汇合中西以成此不朽之作,或者与当时事实不甚相远也!”^③近几十年来,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研究和敦煌学研究的不断深入,敦煌艺术与印度、西域艺术之间关系的新材料也一再被发现,这些发现,也不断地印证着向达先生运用文献与考古调查相结合而得出的敦煌石窟与西域、印度艺术之关系的观点。诚然,向达先生考察、研究敦煌,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他的一些学术观点今天或许被新的研究和材料超越,但他敦煌学研究方法的创新,至今仍是指导我们敦煌学研究的科学方法。

作为一代宗师,向达先生留给我们的不仅是堪可等身的著作和他创造性的研究方法,而且还有他那百折不回的坚韧品格和世界性的学术眼光。正是这种可贵的品格和深厚的学术造诣,使他在当时敦煌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能克服种种困难,做出令同时代人叹服并流芳后世的开创性的学术成就。40年代,傅斯年先生就对向达先生的学术成就作过如是评价:“今日史学界之权威,其研究中外交通,遍观各国所藏敦煌遗物,尤称独步。”^④陈寅恪先生也曾于1964年赠诗“吾有丰干饶舌悔,羨君辛苦缀遗文”^⑤,以赞赏向达先生的人品和学识。

21世纪,敦煌学步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更好地保护和研究敦煌石窟这份祖先留下的丰富文化遗产,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回忆前贤,激励来者!我们要进一步学习和发扬向达先生的高贵品格和开拓创新的探索精神,在敦煌学研究中,更有效地运用文献研究和石窟、考古调查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为中国敦煌学研究事业谱写新的篇章!

① 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第410页。

② 同上,第411—412页。

③ 同上,第413—414页。

④ 荣新江上引文,第212页。

⑤ 陆键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三联书店,1995年,第417页。

书札中的雪泥鸿迹

——中华书局所藏向达致舒新城书札释读

徐 俊

(中华书局)

中华书局档案所存 1949 年前名家书札,在书局成立 80 周年之际,曾由笔者承担编选,收入《中华书局收藏现代名人书信手迹》,于 1992 年 1 月影印出版。当时选择的标准,除了书札的艺术观赏性外,也兼顾所涉内容的史料价值。向达致舒新城书札 9 件,二者兼得,所以悉数收入。2000 年敦煌藏经洞发现百年前后,向达 1936 年 2 月致舒新城、武佛航书札,因为内容涉及欧洲访书计划,以及在大英博物馆查阅敦煌文书的遭遇,受到学术界关注,有关学术论著^①、文化随笔等^②,屡有征引。与向达晚年交往最多的书局前辈谢方先生,后来曾撰写《记 1935 年向达在伦敦给舒新城的一封信》^③,予以介绍。

本文对向达书札中涉及的主要事件,尤其是与向达学术撰著相关的内容,进行简要勾勒,还原向达早期学术活动和生活状况的一个侧面,以纪念向达先生诞辰 110 周年。

一、向达与舒新城、武佛航的乡谊之情

被今人赞为“溆浦三贤”的向达、舒新城和武佛航,1920 年代后期,同时任职于上海出版界,因此而过从甚密。尤其是向达与舒新城,因乡谊而增进工作交往,是向达与中华书局毕生密切合作的最早因缘。

舒新城(1893—1960),1917 年毕业于湖南高等师范本科英语部,进入教育界,先后在长沙、南京、成都等地任教。1925 年返南京,专心于近代教育史方面的研究。当时中华书局正组织编纂《辞海》,以与商务印书馆的《辞源》相抗衡。不久《辞海》遇到人事变动,编辑所所长范源廉出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主编徐元诰出任上海道尹(后任国民政府最高法院院长),编纂工作濒于停顿。1928 年春,舒新城接受陆费逵的延请,接任《辞海》主编。1930 年 1 月,舒新城出任中华书局编辑所所长,此后二十余年,一直是中华书局编辑业务的灵魂人物。1954 年中华书局迁京后,留任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所长。主要著作有《现代教育方法》、《近代中国教育史料》、《近代中国留学史》、《近代中国教育思想史》等。

① 荣新江《中国敦煌学研究与国际视野》,《历史研究》2005 年第 4 期。

② 董桥《向达在伦敦受的气》,《甲申年纪事》,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2004 年。

③ 《书品》2004 年第 5 辑,中华书局。按此信写作时间应为 1936 年。

武佛航,即武培干(1898—1990),1921年毕业于武昌商业学校,任上海商务印书馆会计员。1924年改任《东方杂志》编辑,与同年进入商务编译所的向达为同事。武佛航在编刊之余,埋头著述,发表了大量有关国际贸易和国际问题的文章,出版《中国国际贸易史》等专著。武佛航后转任中华书局,任总公司理事兼账务部主任、中华书局上海总公司经理。1949年后,历任复旦大学教授、国际贸易系主任,上海财经学院教授、贸易系主任,北京对外贸易学院(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授。著有《鸦片战争史》、《中国国际贸易史》、《中国国际贸易概论》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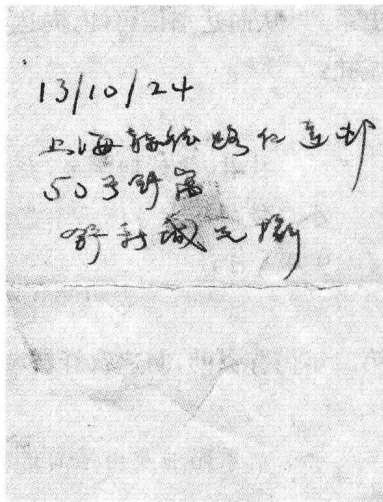
向达(1900—1966)较舒、武二位年轻几岁,1924年东南大学毕业后考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一直到1930年秋离沪北上。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向达的主要工作是翻译。但除了完成繁重的本职工作外,“还和梁思成先生一起翻译了韦尔斯《世界史纲》,自己单独翻译勒柯克的《高昌考古记》”,“又翻译了《印度现代史》”。从1926年到1929年进北图前,共发表论文及翻译文章多达15篇^①,涉及古代印刷史、西域南海史地、佛教文学等多方面。向达一生所涉及的主要学术领域,均由此发端。

向达与舒新城、武佛航除了是同乡、同行外,最大的共同点就是对学术的追求,不满足于做一个单纯的编辑家。从1924年夏到1930年秋,是向达与舒新城、武佛航三位同乡、同行交往最多的时段。向达致舒新城信两次附笔问候舒家小朋友,可见一斑:

特别问候你们那些小朋友,他们把我都全忘了!(1931年2月10日)

君家诸小朋友始终惜墨如金,有往无来,我以后不再过问矣!(1931年5月6日)

书信中有关舒新城资助向达胞妹的内容,更可以说明这一点。阎文儒等《向达先生小传》说:“在商务印书馆任一名普通编辑,工资极为微薄。但向达还是十分关心自己妹妹的学习和生活,把她接到上海来读书。在他的帮助下首先进立达学园补习功课,然后考取了清华大学历



1924年10月24日,向达在上海赫德路舒新城寓所,舒新城摄(陈智超先生提供)

^① 阎文儒、阎万钧《向达先生小传》,《向达先生纪念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

史系。”^①从向达书信可知,向达妹妹向仲在清华的学业一直得到舒新城的资助,向达致舒新城札:

扶君、学鍊助学金,去岁承兄慨然帮忙,今年仍望继续。如汇款可直寄“北平二龙坑小口袋胡同十号陈云皋先生收”,为盼为感。清华开学即在本月十号前后也。(1934年9月4日)

第二年仍有资助,向达致舒新城札:

前承赐书及由平局送来转舍妹款,一一拜悉,感谢之至。(1935年3月30日)

1935年冬,向达从上海远赴英伦,舒新城、武佛航一起前往送行。向达致二位的信,除了由衷的眷念之情,也可以看到他们家人间的密切关系:

黄浦滩头一别,倏将四月,日昨获佛航赐书,敬审近况佳胜,为欣为慰。唯故国山河日益残缺,黏糠及米,宁有已时。他日归来,欲求如别时再叨扰新城兄珍珠丸(?)一次、谋片刻之欢笑,恐亦不易矣。言念及此,曷胜於邑。此次淞邑事变,佛航兄府上亦少受损失,可为扼腕,遥想伯母大人当获平安。佛航兄寄竹报,幸为转致拳拳之意。华北不静,致舍妹等以破书烦新城兄照料,尤为不安。叨在相知,不敢言谢,五内铭感而已。(1936年2月16日)

向达北上后,在给舒新城的信中,谈到离开商务的心情及北上后的打算:

南边暂时是不会回来的了。商务方面大约已蒙撤职,六年的主客,一旦告别,不无惘然之感。但是在我也没有办法。听说佛航也辞职了,真可当得风流云散四个字!这浮萍样的人生啊!

在北方能住多少时候,此时很难说。我想尽这可能的时间,稍稍收敛自己的放心,作一点寻章摘句的工夫。这固然是渺小的工作,但是在我这渺小的人生过程里,已竟是一桩伟业了!(1931年2月10日)

1930年秋,向达离开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转任北平图书馆编辑之职,仍然与舒新城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中华书局所藏向达书札9件,其中前6件均写于1931—1935年任职北平图

^① 阎文儒、阎万钧《向达先生小传》。

书馆期间。

二、《中西交通史》与《斯坦因考古记》出版前后

谢方先生 1958 年秋第一次去北大燕南园拜访向达先生，向先生很感慨地跟他谈起与中华书局的交往，对同乡老友舒新城深为感念：

向先生又和我谈起了一段他和中华书局的往事。他说，解放前中华书局的老板金兆梓和舒新城都和他相识，舒还是他的同乡，也是湖南溆浦人。1932 年他应舒先生之约翻译《甘地自传》，次年即由中华书局出版；接着舒先生又把他写的《中西交通史》一书列入《中华百科全书》，在 1934 年出版；不久舒先生又请他翻译斯坦因的名著《西域考古记》。这样，在不到四年间，他在中华就出版了三部书。他深情地说，应该感谢中华书局，使他在这一时期内得到一笔可观的稿酬，才有可能在经济上支持了他在 1935—1938 年间在欧洲的学术考察活动。现在转眼二十五年后，正在向先生精神上处于困惑时刻，又是中华书局来和他联系出版《中外交通史籍丛刊》。抚今追昔，向先生不禁动了感情。这位表情严肃的学者这时一声感叹，使我多少有点意外。^①

向达提到的这几部著译，在书札中都有具体涉及。《中西交通史》完稿于 1931 年 2 月，2 月 10 日，向达在写完书前《小引》的同一天，给舒新城写信说：

为着《中西交通史纲要》一部书，至再至三的麻烦你，真是十二分的对不住。我也几乎撒了一个小烂污了！现在这本书算是写成了，因为还要覆看一遍，插上几张图，准定明天挂号寄上。只是写得太坏了，务必请你同金子敦先生不客气的指教，使我少出一点丑，那真感激不尽！

本书作为“中华百科全书”之一，1934 年出版。“中华百科全书”是 1930 年 1 月舒新城担任编辑所所长之后，最先提出的选题计划，目的是满足中学生课外阅读或失学青年自修研究之用，但所确立的三项编写要点，即：（一）日常习见现象之学理的说明，（二）取材不与教科书雷同而又能与之相发明，（三）行文生动，易于了解，务期能启发读者自动研究之兴趣^②，使得丛书大受欢迎。此前，向达先生已于 1930 年 4 月完成了《中外交通小史》的撰写，列入商务印书馆“百科小丛书”于 1933 年 10 月出版。二书均列为百科丛书，读者对象相同，但向先生在写作上却各有侧重，商务本以区域叙述为主，中华本以时代先后为序，是两本内容互补的中

① 谢方《忆我和向达先生的首次见面》，《学林往事》，朝华出版社，2000 年。

② 舒新城《中华百科全书总序》，写于 1933 年 3 月。《中西交通史》卷首。